



《中学语文教学论》

参 考 资 料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教学论

参考 资 料

北京、陕西、江苏、上海、广东、
四川、辽宁七省、市教育学院 汇编

中 学 语 文 教 学 论
参 考 资 料

北京、陕西、江苏、上海、广东
四川、辽宁七省、市教育学院汇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和平门外标新街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7印张 390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320

ISBN 7-5419-0007-9/G·7

统一书号：7387·528 定价：3.25元

编写说明

本书是由北京、陕西、江苏、上海、广东、四川和辽宁七省、市教育学院协作编写的《中学语文教学论》的配套书。

汇编这本资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教材《中学语文教学论》的教学，给教师和学员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料。本书收录的资料，都是近年来报刊上讨论语文教学的经验、文章。有的是精选、节录，有的是全文转抄。这本资料在内容上具有四个特点：其一，它将不适宜写进教材的内容补充进来，加深和拓宽对语文教学理论的认识；其二，它向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提供了国内外教育理论和语文教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其三，本书收录了国内外语文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有关情况，给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提供了新信息；其四，在这本书中，还博采了各家的说法，以期引起广大语文教师和语文工作者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因此，这本资料不仅是教育学院中文系学员和高师函授学员学习教材教法的参考书，又可供广大中学语文教师进修教学法参考使用，同时又为广大语文工作者研究教学法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本资料的汇编，从一九八五年四月发起，先后在南京、上海、西安、北京召开制定选编计划，确定编写提纲，安排章节内容和最后定稿的四次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审稿会上，由到会的苏立康、张若晞、雷一鸣、叶灵飞、何炳

骅、钟和成、张彦儒七位同志组成编审组，对这本资料作了认真研究，最后，由张若晞、苏立康二同志统编。

参加本书汇编的有：北京教育学院苏立康（第一章）、陕西教育学院张若晞（第二章）、江苏教育学院雷一鸣（第三、八章）、上海教育学院叶灵飞（第四、五章）、广东教育学院何炳骅（第六、十三章）、四川教育学院钟和成（第七章）抚顺教育学院张彦儒（第九章）、上海教育学院刘寿公（第十、十二章）、上海教育学院王必辉（第十一章）。

本资料的汇编，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参与编写的七所教育学院的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特别是江苏、上海、陕西、北京四省、市教育学院，为本书各阶段的汇编、审稿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陕西教育出版社对书稿的出版给予积极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配合教材编写参考资料书，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尝试，缺点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希望使用这套书的同志、语文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	(1)
第二章 语文教材.....	(21)
第三章 语文教学原则.....	(134)
第四章 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	(162)
第五章 阅读教学.....	(192)
第六章 作文教学.....	(228)
第七章 听说教学.....	(270)
第八章 语文知识教学.....	(321)
第九章 各类课文教学.....	(343)
第十章 语文课外学习活动.....	(423)
第十一章 语文考核.....	(449)
第十二章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476)
第十三章 语文教师.....	(496)
附录 语文教学研究新方法论.....	(512)

第一章 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

第一部份

语言是工具。设置语文这个学科为的是教导学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语文学科的任务是由语言是工具这个性质所规定的。

这个学科的名称是“语文”，“语”指口头语言，听和说，“文”指书面语言，读和写。听和读是自外而内的吸取，说和写是自内而外的表达。说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说的就是运用这个工具来听、说、读、写。说教导学生运用这个工具，说的就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具备了这个能力，无论自外而内的吸取，自内而外的表达，都能够运用自如，这就完成了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

这个任务太重要了。就社会说，就个人说，无时无地不需要语言，无时无地不需要具备运用语言这个工具的能力。因此，我们说，语文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对其他各科的教学说，语文又是一门基础的学科。

.....

语言是工具，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进行语文教学，改进语文教学，都要拿这个基本观念作前提。

摘自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载《教育研究》1982年第2期)

“语文是工具”这一口号，在纠正语文教学的偏向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真理向前多跨出一步就是谬误，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语文是工具”这一口号，会不会走向它的反面呢？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朱熹曾经批评韩愈的“文以载道”论是裂文与道为二物。朱熹的话，曾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自然是道理的。但是，细细琢磨，朱熹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所谓“文以载道”，也就是“语文是工具”。文是运载道的工具，正如同火车是运载旅客的工具，从运载的意义来讲，语文和火车不都是工具吗？

但是，语文毕竟不同于火车。火车和旅客的确可以裂为二物：火车可以离开旅客而独立存在，旅客也可以离开火车而独立存在。火车离开旅客，仍然是火车；旅客离开火车，也仍然是旅客。语文就不同了，有谁见过没有任何意义的语文呢？

两个相声演员说对口相声。逗哏的说：“我是歌唱家，能唱各地方的民歌！捧哏的说：“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地方的民歌”！逗哏的把嘴张开，“呵”了一声，问捧哏的说：“我唱的是什么民歌？捧哏的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逗哏的质问道：“你不是说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捧哏的回答道：“你得唱出歌词呀”！是的，语文是离不开意义的，离开了便只能是“啊”、“呀”等等一类的声音了。

什么是语文？有人说：语文是语言和文学。有人说：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文学也罢，文章也罢，都是语言的艺术。学语文，就是学习使用、掌握、驾驭语言。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外壳是形式，思想是内容。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朱熹的话，就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了。

当然，内容并不等同于形式，形式也并不等同于内容。朱熹把二者等同了起来，这是不对的。但是，既然“文”和“道”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因而，语文的问题首先就应该是一个内容的问题。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把“语文是工具”理解得象“火车是工具”一样，那同样是会出偏向的。

语文的问题，既然首先应该是一个内容的问题，那么，语文的内容应该是怎样的呢？第一应该是丰富的，第二应该是有思想性的。

丰富的：

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能不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姑且可以不谈。但是，孔夫子所以强调要学《诗》，就是因为《诗》的内容丰富。《诗》可以教人学会朝聘应对，可以打动人的感情，可以给人以事父、事君之道，还可以使人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的内容还不丰富吗？

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首先得有一根鱼骨头卡在嗓子眼儿里，然后才有非吐出来不可的要求。如果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儿里，那还有什么可吐的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秀才在写文章，苦思默想，抓耳挠腮，弄了半天，还是写不出来。他的妻子在旁笑道：“你们写文章和我们生孩子一样难。”秀才大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写文章比生孩子难得

多，你们是肚子里有了，我们是肚子里没有！”是啊，肚子里根本什么也没有，还有什么可写的呢？写数学，先得知道数学；写物理，先得知道物理；写历史，先得知道历史。“文以载道”，“道”就是内容，总得有内容，才能供“文”去运载。内容愈丰富，可供“文”运载的东西就愈多。这就是内容必须丰富的原因。

有思想性的：

“语文是工具”不同于“火车是工具”，还表现在思想性上。语文是有思想性的，而火车则没有思想性。一部作品，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革命和反动之分，一列火车则没有这种区别。有谁见过革命的或者是反动的火车呢？没有。

语文既然是有思想性的，因而，语文就不可能不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耳食录》中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昔有读汤临川《牡丹亭》死者，近闻一痴女子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缀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忽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

读《红楼梦》可以入魔，这还不说明了文学作品对人是有强大的感染、教育作用的吗？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一般的例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不少。例如，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激励过多少人的心？而一些黄色小说甚至把某些青年人引入到犯罪的道路上

去，这不都说明了文艺作品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的读者们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吗？

摘自刘国盈《从“语文是工具”谈起》
(载《我和语文教学》)

语言这个工具运用于听、说、读、写，起的是交际的作用；运用于思考问题，起的是思维的作用。就外部语言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就内部语言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用来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这一层是尽人皆知的，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用来思考，这一层有的人或不免于迷惑，脑子里的思想，没有说出来，写出来，让人听，让人读，怎么能说是语言呢？

“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中学语文教育论集》637页，以下简称《论集》)

“人不能凭空地想，必须凭语言来想。”“人在那里思维，同时就是在那里说话。”“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论集》78页)

“语言是思维的定型。所谓定型，不仅定思想的形式，也定思想的质料，那是二而一的。思想拿不出来，定型成为语言才拿得出来，说出来让人家听见，写出来让人家看见，人家凭你的语言就可以知道你想的什么。”(《论集》637页)

思想和语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没有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往往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教学的着力之处不免偏于一个方面。有的偏于着重思想，仿佛思想不必附丽于语言，讲究语言不过是雕虫小技；有的偏于着重语言，对于认识

的开拓，思维的发展，并不措意。这两个“偏”也许说得过了一些，可是教学实际中，这两个“偏”还不能说没有。阅读教学中强调思想政治的阐述，微言大义的发挥，作文教学中只注意怎么写，不注意或者少注意拿什么来写，所写的东西从何而来。说两个“偏”还存在，这就是证明。

“往往有人说，我有些思想，可是说不出来，写不出来；其实这所谓思想还只是没有化为‘不出声的语言’的朦胧一团的知觉而已。”（《论集》78页）

“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论集》112页）

“文章写不通，主要是由于没有想通，半通不通的语言反映半通不通的思想。”（《论集》139页）

思想和语言是统一的，组织思想的过程就是组织语言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要教导学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进行思维活动，思维活动的结果，定型为语言，而后或说或写，表达出来；从接受的对方说，或听或读，凭语言这个工具来理解所表达的思想。

摘自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载《教育研究》1982年第2期）

语言所附丽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语言也同思想的发展变化一块儿发展变化。语文教学必须看到这一点，而有的人却忽视了这一点。

回顾几十年来语文这个工具经历了多少发展变化！一次大的变化是“五四”。白话文打破了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改变了千百年的文语脱离的书面语言，代之以文语一致的书面语言。

这个变化，形式上是文章的变化，实际上是语言的变化，是社会需要的变化。社会需要变化了，语言变化了，文章不得不变化。如果，还是“开科取士”，那么，写它几篇“诗云、子曰”的八股就得了，用不着有什么变化。

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是教导学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而语言这个工具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当前，我们的语言有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再向前，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变化呢？这些问题需要研究回答。在语文教学中，怎么教怎么学，应该研究；教什么，学什么，也应该研究，这个研究似嫌少了一些。我们要拿什么样的语言来教给学生呢？课本上的语言，教师的语言，种种广播、电影、戏剧的语言，大量的书籍报刊上的语言，将给学生以什么样的语言示范呢？我们要引导学生说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文章呢？这些问题需要研究回答。回答的根据，只能是“向前看”，只能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摘自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载《教育研究》1982年第2期）

我们知道，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都涉猎到多方面语文知识的运用，而语文教学又是着重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信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能力的迅猛提高，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就要求人们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检索、传递各种内容新颖而丰富的信息，并随着未来“智能机”的出现，对人们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更严密了。因此，语文作为基础工具课，就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学好其它学科的基础，而且是学生获

得各种科学知识的工具，是发展语言、进行思维与创造的工具。

摘自熊兆武《实用性、培养性、开发性》

(载《中学语文教学通讯》1985年第10期)

第二部份

综合性既指语文课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是由课文（各类文体，各种题材），语法、修辞、逻辑、读写等多门类知识组成的综合体，每一课书也是由表达特定思想内容的字、词、句、篇章结构等综合形成的有机体。综合性也指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形成是语文知识的教学与基本训练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反复深化、综合运用的结果。语文教学的分析性是指语文教材所包括的各门类的专业知识都有其自身的体系，教学中都有各自的重点难点并要求通过相应的基本训练才能有效地转化成一定的应用能力。

语文教学的这种综合性与分析性的逻辑关系既反映语文学科的专业特点，也反映学生思维活动的特点。语文教学最终目的是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各种语文知识与能力参与社会的交流与交际活动。社会的任何有效的交流与交际活动都是综合性的，所以入选到语文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是有机的综合体。但是学生要认识课文，掌握教材，形成能力，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单一到综合的认识与训练过程。教学中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学生思维的分析能力，对综合性的教材加以分析，形成各项专业知识应有的系统，突出它们各自的重 点，突破其难点，克服教材综合性带给教学“眉毛胡子一把

“抓”，打乱学生“单一定向，直线进行”的思维规律的消极影响，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又要始终把注意力放在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上，充分运用学生思维的综合能力，根据各项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失时机地将有关专业知识交错进行教学，组织相应的基本训练，使知识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灵活运用的能力，克服教学中“单打一，只在一条狭窄的知识线下立竿见影”，破坏学生“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综合思维能力的毛病。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础知识的教学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形成科学的体系与合乎逻辑的序列，使学生深入系统地掌握语文基础知识，并因势利导地将知识转化为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语文能力。

摘自罗运清《中学语文教学内部矛盾探索》

(载《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语言是工具的性质决定语言的教学必须重视运用语言的实践。

指导运用语言的实践还应该教给运用语言的知识。斧啊锯啊是木工的工具，斧要往下砍，锯要来回拉，是运用工具的知识，可是有了这个知识，还得在砍啊拉啊的实践中才能够练出运用斧、锯这个工具的本领。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础训练都重要。我看，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得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论集》491页）

知识可以从书本得到，可以从教师的讲授得到，而要化为自己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练。练，要靠教师指导，指导什么，指导怎么练，练始终是自己的事。

“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论集》491页）

“语言运用的好不好，在于得到的语言知识确切不确切，在于能不能把语言知识化为习惯，经常实践。”（《论集》471页）

“习惯总得一点一点地养成。临时来一下，过后就扔了，那养不成习惯。”（《论集》463页）

学会运用语言这个工具，大约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获取知识，到经常实践，到养成习惯，这才算学到手，进而学以致用，把这个习惯用之于新的实践，以适应种种实际需要。做到这样，才能够说是完成了语文教学的任务。

摘自蒋仲仁《语言是工具——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观念》（载《教育研究》1982年第2期）

语文学习的基本性质

1. 模仿的性质 学生靠模仿来丰富语言，并使语言规范化。因为语言有继承性，约定俗成，不能任意创造。模仿有两个条件，一要能懂可取，二要熟记不忘。学生通过模仿——运用——订正，才能达到模仿得象。模仿中包括分析比较，分析实际上是领会模仿的要领：模仿什么与怎样模仿。没有掌握要领的模仿是盲目的模仿，懂得要领的模仿是高效率的模仿。

2. 多通道的性质 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表现实际生活的。耳闻、目睹、交谈，到处有学习语文的机会。这与主要靠教师传授的单通道学科，如数理化和外语等，是不同的。语文信息的多通道，减弱了对课堂教学的依赖，有利于自学。利用多通道的性质，就要重视培养自学能力，重视课内与课外的

配合，语文与其它学科的配合。

3.长效积累的性质 语文学工具要能随用随取，如果没有形成长效积累就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但是，学习语文学工具形成短效积累较易，形成长效积累相当难。这是因为语文学工具数量繁多，联系疏松，组合多变，并且掌握语文学工具必须与提高思想认识、扩大知识面结合着进行，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孤立地进行。

这三项基本性质反映了语文学习的个性。语文学教学的每一步都要符合它，而不可违背它。

与此相联系，有三个从属的性质也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允许单项突出的性质。学生学习语文学的过程中，某一项能力，例如书法、朗诵、写作等，可以突出地发展。在同一学龄的学生中，甚至可以形成悬殊的差距。这些项目的技巧性比较强，而模仿的性质与多通道的性质为这些技巧性项目的突出发展提供了可能。允许单项突出的性质既可以早出人才，又可能使学生“偏食”。一般说来，学生在学习语文学工具期间，需要全面发展听说读写能力。基本功愈扎实愈全面则效率愈高。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一性质，既允许单项突出，又以不妨碍全面发展为限。最好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单项，然后在单项突出的带动下促进全面发展。

其二，需要知识面广博的性质。语文学工具是全社会通用的，学生需要掌握的词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表明学好语文学工具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但是对所涉及的知识只要略知一二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达到专业人员所具有的水平。知识面广博，是丰富语言的需要，也是提高认识能力的需要。人们常说文史哲相通，就是这个道理。反过来说，知识面狭窄，语文学